

结语 遗产·幻影·希望

在邻近的朝鲜半岛发生的那场战争期间，日本获得了一支军队，但 547 却失去了一位最高统帅。美国迅速着手，重新武装往昔的敌人。日本的再军备，没有经过修改宪法的认可，没有取得保守的吉田内阁的热情协力，没有引起商界的欢迎喜悦（尽管确曾出现过推进再军备的财团游说活动），甚至也没有获得民众的足够支持，所以不可能光明正大、直言不讳。组建于 1950 年 7 月的地面部队，仅仅被称作“警察预备队”（NPR），而在其军事操典上隆隆驶过的坦克，也只是被称为“特种车辆”。预备队草创期的训练指导弗兰克·科瓦尔斯基（Frank Kowalski）上校曾经形容：在组织方面和装备方面，警察预备队就是“一支小美军”。在科瓦尔斯基看来，吉田茂拒绝公开承认日本正着手进行再军备，使日本处于“暧昧的再军备黎明期。一方面首相承认必须修改宪法之后，国家才能够拥有‘战力’；但与此同时，警察预备队却在继续装备大炮、坦克和飞机”。在 1952 年 2 月举行的民意调查中，48% 的被调查者认为，否认再军备，是吉田首相在撒谎；40% 的人表示不能确定；只有 12% 的人相信吉田茂的话。

在重整军备问题上，吉田茂祭出了诡辩态度作为其官方策略，但他 548 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吉田茂的小心谨慎，实际上起到了替美国人的狂热态度刹车减速的作用。美国人在激烈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恐慌之中，秘密敦促日方领导人加紧筹建一支 30 万到 35 万人的军队。这是一个鲁莽的、几乎是愚蠢疯狂的要求。吉田茂辩驳说，这种骤然再军备的做法，将会颠覆整个经济基础、扭曲整个经济结构，激起全国的强烈抗

议，并将刺激亚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与美国人不同，并未遽然忘却日本在上次战争中的恐怖行径。

吉田茂还有理由相信，如果日本迅速重建军队，则要甘冒与美方在朝鲜共同作战的巨大风险。吉田茂对于美方强求日本赴朝参战的极端要求异常警戒，以至于当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访问东京敦促日方加紧再军备之时，吉田茂派使者秘密照会两位社会党领导人，敦促他们在首相官衙外举行示威活动，向来访的美国使团施压。这种政治上的小把戏表明，吉田茂希望外界理解他真正忧惧竭力再军备将会使日本的社会组织分崩离析。在吉田政权统治下，整个占领期间，日本警察预备队的规模始终控制在 75000 人。¹

1951 年 4 月 11 日，一条公告如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日本：杜鲁门总统以不服从命令为由，免去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朝鲜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由于公然鼓吹比总统更为强硬的对华军事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前一年 10 月援朝参战），麦克阿瑟将军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包括剥夺他在日本占领期的指挥权。在简明扼要的广播演说中，杜鲁门声明，他已经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采取了行动。理论上，罢免这位最高司令官是文官治军的绝佳例证。而实际上，麦克阿瑟的屈辱，被普遍理解为令人意外的悲剧事件。民众的遗憾之情发自内心而且迅即溢于言表。在总统声明的翌日，自由主义派报纸《朝日新闻》，就发表了题为《惜麦克阿瑟将军》的社论，触动了许多日本人的心弦：

自战争结束至今，我们一直与麦克阿瑟将军生活在一起……当日本人民面临空前的战败困境，而且陷入疲惫绝望的虚脱状态的时候，是麦克阿瑟将军教导我们民主与和平的真谛，并慈爱地指引我们走上这条光明之路。如同为自己孩子的成长感到喜悦一般，他乐于接纳日本人民——昨天的敌人，一步步走向民主，并继续鼓舞我们前进。

4 月 16 日，麦克阿瑟离日赴美之际，享尽了英雄般的待遇。吉田茂首相拜访了他，以感谢他的巨大贡献，并私下致函表达“难以言喻的震惊和难过”。天皇本人不顾宫内厅高官们的阻挠，最后一次诚挚地拜访

了麦克阿瑟的官邸。本来宫内厅强调，既然将军被罢了官职，理应前来拜会天皇陛下才对。这是两位领导人的第 11 次会见——而在天皇离去的时候，麦克阿瑟第一次陪同天皇陛下走到了他的轿车旁边。颇具势力的日本经团连，作为日本大企业复兴的代言人，发表了致谢公告。国会参众两院的议长，也同样赞扬将军的“公正、同情的理解和英明的指导”，并尤其感谢他使国会成为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东京都议会则以“630 万东京居民”的名义，表达了感恩之情，媒体报道说，将制定法律条例授予将军“名誉都民”称号。有人建议设立“麦克阿瑟纪念碑”，甚至要在东京湾为他树立铜像。

麦克阿瑟将军的启程，由日本放送协会（NHK）实况转播，当背景音乐《过去的好时光》（Auld Lang Syne）旋律响起，一位广播员哀伤地重复着“再见了，麦克阿瑟将军”。连小学生们都停课了。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有两百万人沿街为他送行，有些人眼里还噙着泪水。据东京警视厅统计，送行的人数接近 20 万。这一数字仍然可观，也更为可信——麦克阿瑟将军一贯倾向于成十倍地夸大事实。吉田茂和其他内阁成员前往羽田机场为他送行，天皇陛下派出自己的侍从长，国会也派出参众两院的议长作为代表送行。麦克阿瑟乘坐其专机“巴丹号”向蓝天白云间起飞的镜头，触动得《每日新闻》大发感慨：“啊，麦克阿瑟将军——将军，将军，他把日本从混乱和饥饿中拯救了出来，”这份报纸 550 哀泣道，“你看到窗外青青的小麦在风中颤动了吗？今年将会有个好收成。那是将军五年又八个月辛劳的硕果，也是日本人民感恩的象征。”

在美国，麦克阿瑟也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尽管他狂热拥护共和党执政。而日本人也密切关注着他的回国之行。4 月 19 日，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合听证会上发表演说，以他西点军校学员时代流行的一句军歌作为结语，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老战士永不死，他们只是逐渐凋零。”日本的感伤主义者们发现，他们与爱国的美国感伤主义者们一样，为此感动不已。但是 5 月 5 日，麦克阿瑟在参议院联合委员会所作的发言，在日本感伤主义者们听来，就不会那么令人感动了，或者应当说是令他们震动才对。5 月 5 日，历时三天、令人精疲力竭的听证会就要结束了。在此期间，麦克阿瑟不仅顺便高度评价了日本人民令人钦佩的素质和他们经历的“伟大的社会革命”，而且称赞了日本战士在二战中的高超的

战斗精神。麦克阿瑟的意图在于，强调日本人比德国人更可信任。当被问及是否可以指望日本人维护他们在占领期获得的自由成果时，麦克阿瑟以这样的方式作答：

当然，德国的问题与日本的问题大相径庭。德国人是成熟的民族。

如果说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其发展程度上，在科学、艺术、宗教和文化方面正如 45 岁的中年人的话，德国人也完全同样成熟。然而，日本人除了时间上的古老之外，仍然处于受指导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 45 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 12 岁的孩子。

正如任何处于受指导期的儿童，他们易于学习新的规范、新的观念。你能够在他们那儿灌输基本的概念。他们还来得及从头开始，足够灵活并能够接受新的观念。

551 德国人像我们一样成熟。无论德国人做什么无视现代道德标准、国际规范的事情，他都是有意为之。他不是由于缺乏对世界的常识而犯错误，他不像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犯的是无心之错，他是将其作为深思熟虑的策略，他坚信自己的军事实力，他确信其措施将是通往他所渴望的权力和经济控制的捷径……

但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之间没有相似性。我们已经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试图将在日本如此成功的策略应用于德国，在德国至少它们不太成功。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运作。²

麦克阿瑟 3 天听证会的全部记录，长达 174000 字，而这些评论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在日本，仅仅这段话中的几个字就引起了强烈关注：像 12 岁的孩子。这句话就像一记耳光打在了日本人的脸上，同时标志着麦克阿瑟神秘光环的消失。正如麦克阿瑟的传记作者袖井林二郎所言，这些赤裸裸的话使日本人民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曾经如何蜷缩偎依在征服者的膝下。突然之间，许多人感到难以言喻的耻辱。自此刻起，从前的最高统帅开始从记忆中被抹去，就像战时的暴行被抹去一样。设立纪念碑的计划被丢弃了。再也不会竖立什么铜像了。“名誉都

民”的授予仪式永远也不会举行了。几家大公司甚至发布了联合广告作为回应，以大字标题写下“我们不是 12 岁的孩子！日本产品被全世界所尊敬”。——当然，与其说这是事实，不如说这是愿望。然而，这些企业家确乎迅速捕捉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麦克阿瑟有关日本进化落后的演说，恰恰契合了他国对日本不成熟经济居高临下的、轻蔑的评价。³

尽管老战士本人可能会在日本人的意识中逐渐凋零，甚至比他自己料想的要快得多也不光彩得多，但他无意中轻率地标举出来的问题，却不会也不可能消散。毕竟，一向是日本人将自己当作麦克阿瑟的孩子，这也正是 4 月 12 日《朝日新闻》感情冲动的社论的精髓所在。⁴ 整个占领就建立在默许美国压倒性的家长式权威的前提之下；甚至当日本恢复主权临近，甚至当日本重新成为冷战伙伴，美国人也从未期望与日本建立平等关系。日本的新军队是“小美军”，显然注定要继续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下。日本的新经济，则过度依赖美国的援助和庇护。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无论身处冷战阵营的哪一方，实际上都对日本如此急速地抛弃民主议程，复兴保守派势力和促进再军备而感到震惊和警惕。在此氛围之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即便是在名义上恢复了主权，除了不得不仰仗和服从美国，做其实质上的附庸国之外，实在难以想象还会有任何其他出路。

自麦克阿瑟解职到占领期正式结束，一整年的时间过去了。就绝大多数方面而言，这一年中对即将到来的国家独立，人们缺乏喜悦兴奋的期待之情。尽管最终和平条约的签订将涉及许多国家，但却是美国人控制着和平的进程；同时日本为将要并入美国强权控制下的世界和平版图所付出的真实代价，正在逐渐显现。在美国“核保护伞”下进行的再军备，仅是这代价的一部分而已。继续维持遍布全国的美军基地及设施，则是另一项代价。冲绳被排除在恢复主权的范围之外（正如它被排除在占领期的改革措施之外一样），作为主要的美军核基地被托管，无限期地处于新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由于苏联未参与和平谈判，北海道以北岛屿的归属争端依然悬而未决。

和平条约本身由 48 个国家的代表签署，对于日本而言是少限制而多宽容的。然而，事实早就清楚，共产主义国家将会拒绝参加这项将日本如此紧密地捆绑于美国的遏制政策的和解计划。按照当目的说法，摆

在日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条路：要么“单独和谈”，要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和谈。尽管日本的进步人士和左翼竭力呼吁“全面讲和”以及日本保持非武装中立，但在当时严峻的冷战氛围下，这并非现实的选择。直到日本接受单独和谈，1951年9月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正式和谈的盛典之后，吉田政府才真正明白独立的代价会有多高。果不其然，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和平条约生效，除非日本同意与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署一份平行条约。除此之外，还要坚守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强硬政策。这一点使日本企业家和经济计划专家大为震动，因为他们向来将进军中国市场视为理所当然，而这一点也成了他们赞成国家主导、上意下达的产业政策的另一条重要理由。《日美安保

553 条约》及相关的《日美行政协定》，也被证实是美国战后签署的最不平等的双边协议。美国人保留了过多的治外法权，他们要求的军事设施数量，也大大超出任何人的预期。《纽约时报》高明的军事评论员汉森·鲍德温（Hanson Baldwin）准确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即“当日本自由时却仍然不自由的时代”。⁵

对于保守派而言，这是保证日本在分裂的世界中独立与安全所付出的高昂而不可避免的代价。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军事占领状态与过渡性的“从属独立”状态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好庆贺的。据官方宣布，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晚10点30分恢复行使主权。但每个人都报告说，所有街巷都异常安静。大概只有20人左右聚集在皇宫前欢呼万岁。银座的一家百货商店，售出了大约100面太阳旗。盟军最高统帅（SCAP）与总司令部（GHQ）的标识和徽记被撤销，但美军人员并没有大规模撤离，几乎所有人都继续驻留日本。第二天是裕仁天皇的51岁生日。一早，天皇陛下宣谕了两首自寿诗。一首是为和平祈愿；另一首，天皇则欣喜于日本经受了痛苦的战败而根基不变：

冬风已吹过，
八重樱正在盛开，
春天到来了。⁶

在稍后进行的民意调查中，针对日本现在是否独立国家的设问，只

有 41% 的人的答复是肯定的。

这是一个分裂的国家，从领土上来说，冲绳仍然处于被占领状态。同时，日本人对于自己国家新的世界地位的感受，也处于分裂而不安定的状态。然而，最富戏剧性的分裂，还在于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对于这种状况，吉田茂后来曾借朝鲜的分割局面加以描述。他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在日本人民心中划下了一条“三八线”。这指的是自由主义和左翼反政府阵营的出现，他们忠实拥护占领军当局“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初衷，反对日本并入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格局，激烈批评美国政府现在扶持的保守派政客、官僚和大商人群体。许多著名知识分子持这种批判立场，与大众媒体以及工会组织中仍然强大的左翼力量并肩作战。战斗性日益增强的共产党支持者们也是如此，尽管一再被政府打压，领导层被清洗，共产党仍然作为合法组织存续了下来。554

和平条约生效 3 天之后，超过一百万人参加了全国各地举行的 330 多起“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6 年前的 1946 年，在举行这样的“五一”庆祝活动时，显然参与者们都满怀希望，甚至欢欣鼓舞。但是不久之后，5 月 19 日，一场为获取粮食的空前的群众大游行，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发生了。而 1952 年的 5 月 1 日，则最终以“五一流血事件”的名目进入了历史。由于吉田政府禁止使用皇宫广场，并且无视取消此禁令的法令，由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发起的东京“五一”节大集会，只好在著名的明治神宫前的开阔地举行。早上，大约 40 万人聚集在那里，口头表决通过了诸如“反对再军备——为民族独立而战”等决议。集会人群举着密密麻麻的标语旗帜，支持劳动者的经济要求，反对军国主义复活、反对战争、反对美军基地和美国强占冲绳，并要求将 4 月 28 日定为国耻日。游行队伍中还有手绘的标语牌，画着斯大林、毛泽东或是遭到清洗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肖像；有几幅标语牌上用英文写着“滚回家去，美国佬”。

集会就要结束的时候，有人呼吁到被禁入的皇宫前广场上去，自 1946 年示威运动以来，它就一直被称为“人民的广场”。几支游行队伍形成了，大约共有 10000 人，由共产党人、朝鲜人和学生等激进派领导。白领职员跟蓝领工人一起加入了游行队伍，女人与男人一道并肩行进。他们一路行进到皇宫，呼喊着反美和反政府口号。当一队示威者大约

6000人奋力突破警察强大的封锁线，在皇居护城河著名的“二重桥”前停顿下来整理队伍时，暴力冲突发生了。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警察用催泪瓦斯和手枪向人群发动攻击。一位市政府雇员和一名大学生在随后的混战中被打死，共有22名示威者被子弹击中。在人们纷纷逃离到边道上的同时，暴力冲突和破坏行为持续发生，双方的负伤情况都触目惊心。最终共有5000名警察卷入暴力冲突，超过800名警察负伤。示威者的受伤人数几乎是警方的两倍，许多人在试图逃离时因后面的推挤而负伤。大约20辆美国人的汽车被掀翻和焚毁，它们大多数都停在护城河边。3个美国大兵被扔进了护城河，在被别的日本人救上来之前还遭到了石块袭击。有几个美国士兵受了轻伤。“五一流血事件”，在日本的民族意识中烙下了国家分裂的印记。⁷

5月2日，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在新宿御苑主持了缅怀全国战死者的追悼式。这是日本自被占领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公开仪式。政府试图将5月3日的“宪法纪念日”作为1947年宪法颁布和本年度主权回归的双重庆贺日。出席仪式的人数比较稀少。约有15000人聚集在皇宫广场，在那里天皇发表了简短声明。他回顾自己7年前本着“为万世开太平”的初衷，允诺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并表达了对战争中“无数牺牲者”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他告诫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号召以新宪法的民主精神“建设新日本”，劝诫他的臣民团结一致，致力于“综合东西方的文化”。最后天皇宣布，尽管感到负荷沉重，但他并无退位的打算。

一个月后，裕仁天皇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向皇室的创始者和太阳女神天照大神，报告日本恢复主权的消息。⁸

在日本战败和被占领的数年之间，裕仁天皇和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双重统治者统治着日本。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正如磁场的正负两极，他们也担负着不同的角色和使命。而这磁场本身，即全体日本人民，则充满着创造的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现在看来更加清晰。而在占领期结束时，这一点还并不明显。

尽管天皇对和平与宪法的民主多有赞扬，但他仍然是日本历史、文化与民族延续，以及等级社会、父权社会理想的首要象征。无论战争还

是战败时期，天皇一直是政治神坛上的伟大祭司。他对日本恢复独立的贺诗，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巧妙手腕和他新的“象征的君主制”的保守本质：占领期曾经暗淡凄凉，只有现在，真实纯粹的日本才会再现，正如 556 寒风过后八重樱永远会绽放一般。1975 年，当记者问到日本的价值观有否转变时，天皇以更为平实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思绪。他回答说：“我知道，自战争结束以来，人们已经表达过各式各样的观点。但是，从更为广阔的前景看来，我并不认为战前和战后有任何变化。”而且事实上，裕仁继续在位直到 1989 年逝世。他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寿是否也证明了这一点呢？⁹

在日本以外的世界，麦克阿瑟将军在外交方面的奇才比裕仁天皇更为人所知。他对日本人民的印象也与裕仁有显著差异。的确，他喜欢下“东方思维”式的大判断，而他关于“12 岁孩子”的论断是由于殖民心理作祟，这种心理通常会抹杀非西方人民彻底自新的能力。然而，这并不是他发表言辞的初衷。相反，当天皇一贯津津乐道于持续性的时候，麦克阿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颂扬日本人经历的革命性的变革。在他著名的“老战士永不死”的讲演中，他告诉美国国会的议员们，“日本人民自战争以来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并继续以夸张的说法修饰这一断言。他这些话不仅只是对美国人说说而已，他在东京的讲坛上也多次发表同样的看法。通过强调在他任期之内令人鄙视的敌人变化之巨，麦克阿瑟在明显地为自己的脸上贴金。然而我们必须指出，他确实由衷地相信这些话。¹⁰

在日本之外，很少有人将这些意见当真。《纽约时报》上有关日本恢复主权的一篇评论，其副标题是《日本没有变化》。文章解释说，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在 6 年之内改变其民族性”。与天皇发表类似观点不同的是，这里表达了傲慢轻视的意思。与此精神相一致，《泰晤士报》以漫画的形式这样描绘占领期的结束：胜利者巨神一般的双手将一个标着“日本”的小人释放到了“独立”的道路上。这个小人身着传统劳动者的短衫木屐，而他前面的道路曲折蜿蜒，消逝在黑暗之中。¹¹

当然，这个步履蹒跚的小人，是麦克阿瑟关于“12 岁男孩”的更为普遍的图解，这是令许多西方人心安理得的日本先天落后、发育不良的写真，保证既不可能在军事上也不可能在经济上构成任何威胁。直到 1960

557 年代末，日本这个孩子般的小玩意儿和廉价器具的制造者，才进入美国和欧洲人想象的视野。一切好像是在突然之间发生，日本的汽车和优质电子产品涌入了西方市场。几乎一夜之间，小人们被置换了经济“奇人”和“超人”。这种反应很像是 25 年前当日本帝国宣战并震惊西方列强的时代：妖怪再次从瓶子中跑了出来，只是这一次它穿的是西装，而不是黄卡其布军服。

此后整整 20 年，这个前所未有的经济超级大国的奇迹，将会风靡和震惊大半个世界，掀起大规模的所谓日本模式的论潮。1979 年，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写了一本名叫《日本第一》的书，“日本第一”的观念，使人们目瞪口呆。震惊一部分来自于这样的暗示：西方人统治世界的全盛时期结束了；同样令人震惊的是这样的事实：“第一”的评价，被授予了一个不久之前还一片废墟、被当作“四流国家”不予考虑的国度。专家们质询如何解释这种转变，通常的回答是，必须从日本深层的历史和传统价值中寻找根源。评论家们生造了像“民族经济学”这样的新词来说明问题。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决定论者，则重新打磨“文明的冲突”的老调来进行阐释。¹²

“新生”成为日本战败初期最受欢迎的词汇。然而在往昔的蔑视者眼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竟然如此壮观地复兴，简直是远远超出了任何日本人的想象。这是复仇的偿还，而且它引起了日本人的语言快感，有关战争年代“领导民族”的观念，乃至“大东亚共荣圈”初期狂妄自大的言论，开始重新登场。陶醉于自己国家的突然崛起，学者和文化批评者们陷入了关于“作为日本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无休止的讨论之中。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广为流行的这种“日本人论”的调门，很快成为了某种反义词游戏：将“原日本的”定义为与“原西方的”的价值取向完全相反的两极。如群体和谐对应个人主义，特殊主义对应普遍主义，重视主观直觉对应极端理性推论，重视调解对应重视诉讼，垂直型人际关系对应平行型人际关系，等等。战争时代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大和魂”的偏激氛围，再次变得浓厚起来。

558 这种对血统和文化固执而夸张的态度需要引起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在众多的现代社会中，血统和文化的因素已经被过度关注。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种族、文化和历史，就是发明集体身份和意识形态的

素材。然而，要了解日本站在二十一世纪起点的现状，与其去了解日本在历史长河中漫长演变的民族经验，不如去了解日本从 1920 年代末开始到 1989 年实际结束的近阶段的历史周期。当仔细审视这个短暂、暴力、创新的时代的时候，被当作战后的“日本模式”的，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一种混血的“日本—美国模式”：锻造于战争年代，加强于战败和被占领时期，由于对国家虚弱的长期惧怕以及日本需要顶级计划及保护以实现最大经济增长的广泛信仰，得以在接下来的年代中继续维持。如果不了解胜利者和战败者如何共同拥抱日本的战败，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就无法被理解。借用战败初期流传的幽默新词汇来说，所谓的“日本模式”，可以更恰切地描述为“占领军模式”。

日本现代经验的短暂周期，几乎与裕仁天皇的统治时期完全一致。天皇是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意识形态的试金石，是从肆无忌惮的军国主义了无痕迹地过渡到帝制民主的象征。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对那些希望强调种族和文化的“国民统合”者而言，天皇都是最显而易见的图腾号召。对于他的臣民们而言，1989 年裕仁天皇驾崩，的确是一个时代结束的信号：昭和时代结束了，旧符得换成新桃了。然而，使这一年真正成为一个大时代的终结的，是其他一些重要事件的汇合。柏林墙倒掉了，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了。一切变得昭然若揭：当日本一心一意地追求在经济和技术上“赶超”西方的时候，忽略了制定新的规划所需要的远见和弹性。曾经产生出日本这一超级大国的体制，正在坍塌。天皇裕仁以其一贯典型的好运气，避开了这一切。他去世的正是时候。

这些年来，有些日期被当代的编年史家拣选出来，作为日本战后时代终结的标记。1955 年，日本经济企画厅如释重负地宣布“‘战后时期’结束”，其为时过早的宣告，是建立在全部的生产指标终于恢复到战前水平的事实基础之上。1960 年，当日本政府镇压了激进的劳工主义者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池田勇人首相开创了他颇为自负的“所得倍增”计划，使得这一年被指定为另一个进入新时期的标志。¹³ 1979 年亦复如此，当时“日本第一”的狂潮正在袭来。当所有这一切平息之后，1989 年仍然会成为“漫长的战后时代”真正终结的年份，这一时代从天皇的声音第一次被他的臣民们听到开始。它历时 44 年。

1945年无疑是个分水岭，正如1868年一样关系重大——当时封建统治被推翻，新的明治政府建立起来。在日本，总有读者关注那些聚焦于1945年的书籍，有些书实际上只聚焦于1945年8月，甚至是只关注8月15日的事件。而现在已经很清楚，日本战时直到战后年代的建构性遗产是庞大的。日本帝国在大萧条初始，即着手动员全国的资源用于可能爆发的战争；自1930年代初起，建设“全面战争”能力的观念（即一旦发生战争，有能力发动国家的各个部门全力投入），在军事和官僚政治的圈子里得到了大大推进；而产业与金融的一体化则较晚，最终在所谓的“1940年体制”中得以实现。这就是盟军占领日本时的事实基础，而这也是美国人赖以维持长期统治的体系。

从战争体系中继承而来的各种制度，并非本质上就是军国主义的。例如，产业订单下包制度，就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同时还有对少数民间银行的金融依存度的增长。所有这些成为了战后经济“系列”组织结构的核心。大企业强调员工保障，实行“终身雇佣制”，将员工稳定问题置于股东利益之前，通常被作为战后日本体系的突出特征，而其真正起源也是在战争年代。同样，政府向商业和工业提供“行政管理”的“密切指导”也是如此。面对战败的无底洞，遭遇令人心惊的战后危机，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维持这样的安排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承蒙他们美国领主的恩赐，也的确如此实行的。后来许多所谓的“日本模式”，
560 被笼罩于儒家伦理的光环之下，其实只不过是延续了战时萌生的方略；而战后的规划者保留继承这些，并非因为他们是隐匿下来的军国主义分子，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在不利的世界中，最大限度推进经济增长的合理道路。¹⁴

在这个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保守派官僚。正是在这一点上，占领军的举措产生了重大失误：未能抑制官僚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事务方面。美国改革者的确相当显著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最为著名的是农地改革、财阀持株会社的解体以及立法保障工会劳动者前所未有的权益。他们还强制实施了一些具有长期影响的官僚体制的具体改革，取消军事组织并拆分了支配警察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强大的内务省。但为了方便起见，他们的确保留了剩余的官僚机构，以及更广泛的“1940年体制”。通过现有渠道实施工作，使得贯彻占领方针更为容易；而从根本

上改变这一体系，则会在本已混乱的情势下发生骚乱。

但这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因为胜利者也应该为这一点负责——他们巩固了业已十分强大的官僚政治体系本身，而从这里，就可看出“战后模式”本质上的混血特性。自他们到来的那一刻起，美国人就以其保护姿态加强了官僚机构的职责和权威。当冷战的考虑占了上风，占领方针的“逆流”正式启动。是美国人推进了行政的“合理化”，导致了官僚政治权威的进一步集中。创设于占领期结束前三年的强有力的通商产业省，就是日本官僚组织强化最鲜明的例证。

此外，处于这一切之上的，是盟军总司令部以自己的惯有方式形成的官僚政治模式。美国人真的是作为“解放军”到来的，正如共产党人也曾经一度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确启动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议程。而他们自己却像官僚一样施行统治。麦克阿瑟将军的权威“至高无上”。从他的总司令部发出的指令不容更改。甚至总部里下级官僚们的建议，也能对非正式命令施加影响。坐落于东京的“小美国”朝廷，整个统治结构等级森严。在这一超级政府中，没有“透明度”可言，它不必对日本的任何人负责。有日本记者想要报道自己国家首相们的懦弱，⁵⁶¹因为他们只能对美国人应声附和。但由于总司令部的审阅官大笔一挥，记者的愿望终成泡影。事实表明，一个国家不必继承儒家文化，就能推行独裁政治、权威崇拜、和合第一、舆论一致以及自我束缚。

盟军总司令部自上而下的新殖民主义改革不同寻常，因为它是柄双刃剑：既真诚地推动了进步变革，也重新强化了独裁统治结构。谈到战时体系和战后体系的环环相扣，就会使人联想到盟军总司令部正是症结所在：征服者赋予日本国会以新的权威，但却选择以官僚政治的方式起草和提交法案。他们促进了负责任的文官内阁的产生，然后又以自己的规则阉割了它。人们往往能够正确指出：自1930年代初期直到1945年，日本都处于彻底的独裁和军国主义统治之下，但事实上，日本继续处于军事控制之中直到1952年。

这是进退维谷的民主政治，麦克阿瑟将军对裕仁天皇的格外体恤，使得问题更为复杂：延迟而非促进了社会的真正多元化、公众参与和行政负责制理想的实现。然而，尽管存在日美合作的官僚政治崇拜、从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和平时期的大政翼赞会的古老体制，还有以天皇为代

表的回避责任的神秘做法，以及新的帝制民主的不健全之处，但麦克阿瑟在肯定这个社会所经历的重大变革时，他还是相当正确的。相比于日本的帝国时代，战后的日本是个极其自由和主张人人平等的国家。它的人民已经变得对军国主义和战争极为谨慎，世界上少有其他国家堪与匹敌。一种健全的搞笑的荒诞感弥漫于流行文化之中，尽管很少有外国人欣赏这一点。当中立派和保守派仍然牢牢控制大权，公众舆论却以在美国都不可思议的宽容方式，继续支持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言。

这也是一种日美混血的遗产，充满了矛盾和混乱的讯息。这些对立而复杂情形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围绕引人瞩目的新宪法继续展开的争论。如果没有征服者，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国家宪章，而一旦占领期结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国会修改宪法。事实上，美国人自己很快就希冀并游说这样的修正了：宪法第九条如此妨碍日本的再军事化，使得盟军总司令部在指挥召开小型的秘密“宪法制定会议”后的一周内就感到后悔了。然而，当 1997 年庆祝宪法施行 50 周年时，它一字一句也未曾更动。保守派从未能够超出修宪必须的 2/3 的国会议席，而且他们也没有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民众的怒吼。
562

在不久的将来，宪法很有可能被修改，但是其中涉及的问题，仍然可以反映出当今日本民众的政治意识。尽管宪法第九条已经被扭曲变形，以维持“自卫”能力的名义被不断扩充阐释，但它毕竟仍然作为具有强制效力的不战理想的宣言，与宪法导言中强烈反战的言辞一同留了下来。二战后“杜绝战争”的梦想打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但却从未载入其他国家的宪法或法律。任何有关再军备的事件，在日本都必须受制于对战争与和平基本问题的承诺，由法律和宪法加以保障，这种方式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占领初期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理想，以这种意料不到的方式，超越半个世纪鲜活地留存在了日本民众的意识之中。

日本的和平梦想实际上无所慰藉，因为它们首先是停留在有关二战的恐怖记忆之中——数百万日本人白白地付出了性命；战争第一次以大规模空袭的方式向日本本土袭来，当然接下来还有广岛和长崎的“原爆”；战败数年后日本人民还经常三餐不继，甚至无法公然哀悼战争中的死者：他们的父亲、丈夫、兄弟，仍然被全世界人民视为杀人凶手而

责骂。这种深深的痛楚和受骗的感觉，被一种日益增长的、而且不完全是毫无道理的想法所强化：日本正在被其他国家以并不施之于自身的标准评判着。日本人感受到的双重标准和胜利者的正义观，曾经使东京战犯审判变得黯淡，而且由于受到其他国家的残虐行为、否认事实和虚伪证词的刺激，这种感觉正与日俱增。甚至那些认可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日本和平活动家，和那些致力于证实和公布日军暴行的人，都无法为审判战犯的方式辩护；他们也无从为美国在免除天皇战争责任的决定之后，又在冷战的寒流中，释放并随即公开接纳被控的右翼战犯（如后来的首相岸信介等人）而辩护。

在漫长的战后时期，那些掌控日本迅猛复苏的精英们，几乎全都出自亲身体验过战争和战败的那几代人。由于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相对落后和物质资源的相对匮乏，他们将过去的战争看成是愚蠢之举。他们着力避免这种灾难的重演。而且他们对日本一旦成为真正的军事强国，易于制造核武器而将引发全球抗议极端敏感。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战后作为“悔恨共同体”出现的进步的左翼学者持有相同的自我批判观点。有些人则属于懊悔战败的“后悔共同体”。颇有几位将记忆中的“大东亚战争”，当作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军阀，驱逐在东南亚的欧美帝国主义者而发动的战争。当谈到日本的极端暴行时，许多人都坚持否认。事实上，所有的人都真诚地悲恸那些为国捐躯的亲友和熟人。他们也还记得战败后数年间，白人胜利者轻蔑地将他们看作“小男人”而引起的迷茫困惑。

这些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现在几乎都淡出了历史舞台。对于裕仁统治的前20年间日本所犯下的掠夺罪行，此时正当需要明确承认和道歉的历史时刻，而在他们身后却只留下了糟糕的记录。在他们心目中，承认这个，就包括必须承认“东京审判史观”，而那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爱国心，为他们的国家招来了多数外部世界的轻蔑和不信任。同时，这些精英们也为他们的继任者遗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具备严重打击报复他国的独立军事力量的日本，是否值得其他国家和人民严肃对待？这是“宪法第九条”的遗留问题，这是“单独讲和”的遗留问题，也是《美日安保条约》的遗留问题。这是在附庸于美国的独立之下结束被占领状态、恢复名义上的主权所遗留的问题。日本忠于宪

法第九条的精神，却招来了世界的奚落。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突袭伊拉克时，日本因只提供金钱援助而拒绝派军受到嘲笑，对日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伤痛。毫无疑问，如果捐弃宪法第九条，将会引发对日本复仇主义者的强烈抗议；因为除了日本保守派，没有人会忘记南京大屠杀。日本独特的和平梦想已经陷入了令人苦恼的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些战败和占领期错综交织的遗留问题，以循环往复的方式展开。

564 既然已经被军事托管，并由此导致对华盛顿的外交从属，那么留给日本领导层保住战后日本民族自尊的，就唯有经济一途。敏感、受伤，而又十分脆弱的日本民族自尊心，只能表现在全心全意地追求经济增长之中。由此，在屈辱战败的25年后，日本崛起成为一时的经济强国。这种追求的特征，表现为重商主义心态和近乎病态的保护主义的经济防卫策略体系，其实是不出所料的。或许最终，真正能够信任的只有自己？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悬而未决。没有人能够确定日本将走向何方，而且也没有人再念叨“日本第一”了。不确定性令人忧虑，但降低期望值肯定有益无害——然而，这实在又令人悲哀。为什么？因为随着日本模式（“占领军模式”）而变得不那么光彩的事物，其实正反映了占领初期“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方针那些特定的理想。日本经济学家和官僚为计划经济起草了1946年的蓝图，对于这些目标极其明确。当然，他们寻求急速的经济复兴和最大限度的经济成长只关注实现经济的非军事化和经济民主的目标。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们推行的这种有导向性的资本主义，在实现这些目标方面是成功的。日本变得富裕了。每个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都飞速提高。收入分配比美国要公平得多。经济成长的达成，无需过度依赖军事产业体系或者繁荣旺盛的武器贸易。

这些都不是无足轻重的目标，但是目前，“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理想正随着战后体系各个方面的必然崩溃而被丢弃。战败的教训和遗产，确实已经很多而且也千差万别；然而它们的终结还远未到来。

注释：

¹ 笔者曾在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 - 1954*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79) pp. 373 - 400 与论文集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pp.

155 – 207 的 “Occupied Japan and the Cold War in Asia” 一文中，涉及日本的再军备以及日本作为美国的冷战同盟国重新出现的问题。关于日本的再军备问题，还可参见秦郁彦《史录日本再军备》（东京：文艺春秋，1976）。科瓦尔斯基（Kowalski）上校有趣的回忆，见于日文版的《日本再军备》（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69）一书，但从未出过英文版。吉田茂敦促社会党组织示威一事见于 Takeshi Igarashi, “Peace-making and Party Politics: The Formation of the Domestic Foreign-Policy System in Postwar Japan” 一文，*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1.2 (1985), p. 350。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确曾秘密部署日本扫雷舰，而在 1952 年 10 月，吉田茂也赞同将警察预备队扩充至 11 万人。

- 2 尽管这些听证会不是公开进行的，但会议笔录随即公布面世，仅仅出于安全原因进行了少许删节，并全文发表于诸如《纽约时报》等报刊上。正式记录，参见 U. S. Senate,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ilitary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May 1951, part 1, 尤其是 p. 312。
- 3 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讲谈社，1989），第九卷，pp. 142 – 146；此文献下引为 SNNZ。还可参见袖井林二郎《マッカーサーの二千日》（东京：中央公论社，1974）。把日本人（和东方人）比喻为“孩童”，是西方人非常普遍的看法。例如，当听说许多日本人对麦克阿瑟的解职感到焦虑不安时，4 月 15 号的《纽约时报》周日版评论说，“这种看法可能挺傻，甚至孩子气，但毫无疑问真的存在”。
- 4 关于占领期题材，最有名的日本电影是篠田正浩导演的《マッカーサーの子供たち》，于 1984 年上映。
- 5 《纽约时报》，1952 年 4 月 19 日。
- 6 《天皇陛下の昭和史》（东京：双葉社，1987），p. 131。天皇诗作的其他英译，参见《纽约时报》，1952 年 4 月 29 日，以及 *Facts on File 1952*, p. 132。
- 7 SNNZ 9: 249 – 251；大河内一男编《资料·战后二十年》（东京：日本评论社，1966），第四卷（劳动），pp. 198 – 200。另参见《纽约时报》1952 年 5 月 2 日。当时超过 1200 人被捕，其中 261 人以引发公众骚乱为由被起诉，约 100 人被判有罪。令人惊奇的是，这一诉讼案一直拖延了 20 年。
- 8 当时，天皇的声明文件再版于日本新闻研究会编《昭和“发言”の记录》（东京：东急エージェンシー，1989），p. 134。天皇的伊势神宫之行见于 SNNZ 9: 262。
- 9 高桥纮，《陛下、お尋ね申し上げます》（东京：文春文库，1988），pp. 212, 217。
- 10 麦克阿瑟关于当时朝鲜战争状况的演说，其有关部分全文如下：

自战争以来，日本人民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他们以值得赞赏的意志、学习意愿和显著的理解能力，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上建立起致力于个人自由、人格尊严的大厦，而且在随后的进程中，创立了真正典型的忠于政治道德进步、经济活动自由和向社会正义迈进的民主政府。

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现在日本都与地球上的许多自由国家并肩站在一起，而且将不会再辜负世界的信任。可以仰赖日本在亚洲事务进程中发挥深远的有益影响，这一点业已被日本人民在遭遇最近的外部战争、动荡和混乱危机时的高尚姿态，以及日本在丝毫不延缓前进步伐的前提下，有效抑制国内的共产主义的做法所证明。

我将我们占领军的全部4个师都派往了朝鲜战场，丝毫不必顾虑由此导致的日本后防空虚。结果证明我的信任完全正确。

我觉得没有比日本更加安宁平静、有秩序和勤奋向上的民族了，在对人类的未来做出建设性贡献方面，也没有国家比日本更值得寄予厚望。

11 《纽约时报》，1952年4月29日、5月4日。

12 Ezra 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ethno-economics”（民族经济学）一词在 Murray Sayle 发表于 *JPRI Working Paper No. 43*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March 1998) 上的“*How Rich Japan Mistreated Poor Asia*”一文中有详细阐释。近来对于日本根深蒂固的“岛国根性”最为尖锐的批评，是 Ivan P. Hall 的 *Cartels of the Mind: Japan's Intellectual Closed Shop* (New York: Norton, 1998)。

13 1960年，在日本发生激烈的示威游行之后，美日之间极端不平等的《安保条约》被加以修订，似乎构成了确保那一年成为战后时代结束标志的第三项事件。

14 关于战争遗产问题，参见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中“*The Useful War*”一文，pp. 9 – 32；还可参见 Jun Sakudo 与 Takao Shiba 编，*World War I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System*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94)，尤其是其中的 Takeo Kikkaw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ompanies in Japan during and after World War II*”，Satoshi Sasaki, “*The Rat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s i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以及 Takao Shiba, “*Business Activitie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World War II*”等论文。经济学家、前大藏省官员野口悠纪雄与牛尾治朗在“*Reforming Japan's 'War-Footing' Economic System*”的对话中，强调“1940年体制”的持续论，见载于 *Japan Echo* 21.2 (summer 1994), pp. 13 – 18。

图片提供者名单

(按原书页码)

- 朝日新闻社: 50, 55, 145, 186, 260, 319, 333, 393 页
远藤健郎: 135 页 (摘自《昭和マンガ史》每日新闻社 1977 年版, 132 页)
林忠彦: 62, 155, 159, 166 页
加藤悦郎: 66, 68, 70 页 (摘自加藤《贈られた革命》コバルト社, 1946 年版)
共同通信社: 3, 35, 83, 92, 106, 111, 197, 346 页
MacArthur Memorial (麦克阿瑟纪念馆): 131, 137, 203, 204, 210, 228, 525,
547 页
每日新闻社: 135, 335 页
Prange Collection (Prange 文库, 美国马里兰大学): 405 页
National Archives (美国国立档案馆): 7, 13, 19, 33, 37, 39, 40, 42, 46, 47,
48, 49, 53, 57, 65, 72, 76, 78, 79, 87, 88, 90, 95, 99, 101, 128, 129,
136, 142, 147, 168, 176, 208, 225, 230, 234, 235, 243, 252, 254, 259, 271,
277, 294, 302, 332, 334, 368, 443, 446, 448, 451, 452, 485, 512, 565 页
吉田润: 121, 125, 152, 153 页